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健全和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

□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对分配制度、对生产要素构成等认识的持续深化。健全这一制度，对于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理论上回答了两大问题

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长期以来，哪些生产要素可参与分配，如何按生产要素来分配收入等问题，理论上并不十分明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从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出发，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新趋势和新特征，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为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指明了方向。

一是明确了哪些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自然就是参与分配的主要生产要素。改革开放后，我国所有制成分逐渐多元化，自然也要求分配方式多元化。为了鼓励其他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我国逐渐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明确了个人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行董事会、经理层等成员按照各自职责和贡献取得报酬的办法”，认可了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明确列为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进一步加入了知识这一生产要素。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要素体系。劳动、资本、土地是数量型的生产要素，适应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需要；而知识、技术、管理是质量型生产要素，反映了高质量发展对生产要素的投入要求；数据是经济活动数字化进程的需要，体现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分配制度的与时俱进。

二是明确了如何按生产要素来分配收入。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要参与分配，但是生产要素怎样参与分配？按什么标准来决定不同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比例？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很可能导致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也会严重影响生产要素拥有主体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参照的不是要素的投入，而是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贡献越大，分配越多。但谁来决定要素的贡献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明确了由市场来评价贡献的机制。生产要素的贡献由市场说了算，各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市场交易中，通过生产要素的供求变化和价格来反映要素的稀缺度，进而评价要素的贡献。何种生产要素更稀缺，这种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就大，市场对其评价就高，贡献就大，相应地其分配可能就多。比如，近年来，劳动力相对稀缺，市场对劳动力的贡献评价就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在提高。而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知识、技术、管理等资源的需求增加，这些要素的稀缺度提高，市场对其贡献的评价就高，其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也会相应提高。近年来，我国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注重发挥企业家精神等，就是对这一趋势的反映。

从三个方面健全机制

如何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呢？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明确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产权归属，实行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同商品一样，若没有所有者，生产要素也不能自己进入交换，并进而投入生产。因此，明确产权、保护产权是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并获得收入的前提，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实际上是收入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要实行最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清晰界定所有、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处置等产权权能的制度安排，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要优化产权配置，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要突出保护各类知识产权，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

第二，建设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由市场评价要素的贡献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要素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商品市场，但要素市场发展较为滞后，要素市场上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价格扭曲、市场壁垒等现象较多存在。为此，首先要建设一个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既要打破城乡分割，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也要打破区域和条块分割，建设统一的知识产权市场，还要打破数据孤岛，引导培育数据交易市场，更要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要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各项规定和做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其次要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完善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完善劳动参与分配的机制，坚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让不同种类、不同强度的劳动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巩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完善资本参与分配的机制，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收益与风险匹配机制，让不同期限、承担不同风险的资金获得合理收益和风险补偿。完善土地参与分配的机制，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知识参与分配的机制，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构建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完善技术参与分配的机制，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建立健全对科研人员实施股权、期权和分红激励的机制。完善管理参与分配的机制，突出抓好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统筹用好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股权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措施，激发各级管理人员的活力。完善数据参与分配的机制，建立健全数据权属、公开、共享、交易规则，让数据所有者能够从数据使用中获得应有收益。

总之，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是党中央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出的科学决断，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在实践中深刻领会，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贯彻落实推进，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执笔：陈启清）

学术经纬

坚持政策协同 助力乡村振兴

□ 崔建军 朱函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推动乡村振兴，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自身投入积极性的基础上，协同用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资金“活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分析起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归根结底是城乡关系统筹规划不足，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长期向城市“单向流动”，缺乏城乡互惠互动机制。众多生产要素中，资金作为一种先导性资本，对各项资源的配置起重要作用。因此，需充分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资金调控引导功能，使之通过功效互补、时效衔接发挥乘数效应，从而最大化地撬动社会资本，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第一，以政策协同助力乡村振兴，需合理分工，实现优势互补。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助力乡村振兴，需仔细分辨各自功效领域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对于功效领域相差异的部分，应注重二者的侧重点，通过合理分工实现优势互补。财政政策方面，要侧重发挥其无偿性等特点，着力于市场化机制中资源无法优化配置的领域，降低资源要素流入农村的成本，使生产要素进得来、留得住。货币政策方面，要侧重对农村实体经济的扶植，培育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使已流入的生产要素与当地产业有机结合并迅速产生经济效益，从而实现由短期靠“输血”到长期自身“造血”的重要转化。

对于财政支农资金，要统筹规划、高效利用。要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农责任，确保农地财政收入取之于农、用之于农。要增强支农专项转移支付的倾斜力度，细化其支持方式与监管措施；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纯公共产品的投入，逐步提高农村社会教育、医疗、养老和文化服务保障水平，缩小城乡间基础公共服务差距，促使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提高农业补贴制度和税收优惠制度的精准性和指向性，建议在保证主要粮食作物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对于大豆、玉米等结构性短缺作物的农业生产补贴，确保粮食安全。

金融资金则应聚焦于乡村实体经济，通过对特色农业和龙头企业的扶植，加快农业产业升级优化，发挥以点带面的经济效应。要构建错位发展、适度竞争的多元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明确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不同金融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职责分工，提高投入“三农”建设的信贷比例与资金效率；拓宽乡村振兴融资渠道，完善直接融资市场，鼓励证券、基金、信托、保险、期货等机构服务于乡村振兴。要通过探索农产品信托和农村资产信托等方式，增加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通过丰富政策性涉农保险品种，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此外，还要打造有针对性的互联网金融与电子金融产品，提供线上线下的农产品服务；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提供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综合融资服务，加快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

第二，以政策协同助力乡村振兴，需形成合力，实现强强联合。

协同用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找准契合点，优化协同路径，打通传导壁垒，提高运行效率，形成合力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通过财政与金融的有机结合，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的支农效率。政府与金融机构相合作，可考虑优先对有创业计划和资金需求的贫困农户发放无息小额贷款，挖掘农村劳动力的潜在动能，激发其创业、守业的积极性。

二是通过财政与金融的相互配合，改善“三农”融资环境。财政可为金融贷款建立贴息、风险担保及税收优惠机制，促使金融机构以扩大贷款范围、降低贷款利率、增加贷款额度等方式将资金引导到所需扶植的农业企业上来。同时还可探索承包土地经营权担保等增信措施，形成可持续的信贷循环系统。

三是通过财政与金融的互相联动，撬动社会资本回流。通过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与公开市场操作相配合向乡村发展注入资金。完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推动农业投融资平台建设，广泛吸纳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引导其向支农、助农的重点优势项目聚拢与回流。

第三，以政策协同助力乡村振兴，需加强保障，推动高效实施。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乡村振兴，不仅依赖于其各自优势领域的协同整合和执行过程中的分工配合，更依赖于多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因此，需从制度、法律、人才、科技等方面构建多维度保障框架，以充分发挥其协同功效。

制度保障方面，要提升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保障力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立法、明确事权、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等措施加强财政政策执行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划分职责分工、调整金融结构及完善农业信用体系等措施提高金融系统支农效率。

法律保障方面，要完善现有《预算法》等法规，增加支农条款，提高支农资金的比重；同时探索推进乡村振兴相关立法，深化农村改革，为充分发挥政策效用空间提供保障。

人才保障方面，要借鉴国内外人力资本积累经验，从“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等多方面健全人力资源保障机制。加强乡村专业人才培养，通过技术培训与创业培训，增强农业生产者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提高其金融风险意识与信用意识；加强人才环境建设与优化，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引导更多城市人才流入乡村创业就业。

科技保障方面，要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乡村振兴中的资金流向和运作效率进行监督，确保支农资金的落实。同时，还要发挥城市的科技研发优势，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通过加大农业技术创新力度，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之声

在抗“疫”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 刘春荣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站位、大局意识、担当精神、工作作风的一次重大考验。各级党委（党组）都应认清肩负的责任使命，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切实做好工作，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组织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把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当前，无论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还是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其他方面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都必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加强党的领导，就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史、新中国史都表明，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党中央有权威，党就有力量。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任何组织和成员必须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必须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战场。现在，我们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到大风大浪来了就手忙脚乱，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各级党组织要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干部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对紧要关头当“逃兵”的要就地免职。要及时宣传和表彰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和先进集体。同时，还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党员干部的锻炼，在重大斗争中主动安排更多优秀干部去经受锻炼，在攻坚克难中进一步增长胆识和才干，这对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政策执行力大有好处。

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领导14亿人口的大国，没有过硬执政本领是不行的。只有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着力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才能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从总体上看，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本领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党和国家事业越发展，对领导干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广大党员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努力增强本领。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增强政治领导本领，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善于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增强狠抓落实本领，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增强新动能 促进稳就业

□ 耿 阳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就业受到较大影响，引起中央高度关注。近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贯彻好这些重要指示，抓住互联网平台经济创造的稳就业良机，把增强新动能与促进稳就业结合起来，应成为各地各部门要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稳就业居“六稳”之首，对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受此次疫情影响，各行各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以两类人群的就业最为严峻：一为今年874万名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一为约3亿名农民工，他们返工面临出乡、进城限制等多重困难。有数据显示，今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期间，网上招聘总量较去年同期同比下降83%。2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稳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推出鼓励吸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的措施。此前，国务院已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多措并举稳企业稳就业。这些举措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应尽快落实。此外，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尤其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显示出其特有的优势。以美团为例，自疫情发生以来的一个月左右时间，其外卖骑手岗位已新吸纳7.5万人左右；之后又启动“春归计划”，拟招聘1000名毕业生、新增20万个骑手岗位。政府与企业上下联动，不仅对于抗击疫情、稳定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经济转换增长动力也具有重要启示。

眼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任务更加紧迫。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新动能持续稳定发力，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具有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可覆盖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需求，兼顾长期就业与灵活就业，起到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这表明，过去几年中央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各部门应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继续发展数字经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服务业发展，培育新动能。

以新动能促进稳就业，要在理论上厘清两种绝对化认识。近年来，新动能在我国蓬勃发展，由于其强调高人力资本投入和高科技含量，人们往往认为，新动能兴起必然伴随着传统产业衰落；培育新动能需要的是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必然遭到淘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使得人们对“机器换人”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要看到，借助“互联网+”，促进产业升级并提高劳动力资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一过程并非线性的，也并不意味着增强新动能一定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研究显示，新动能创造的就业多于损失的就业，只是近年来这一差值有所缩小。新动能之所以能够在整体上带动就业，关键在于它的产业融合功能与就业联动效应。就业融合度提高越快的产业，其产业规模增长得也越快。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互联网平台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供需双方迅速对接，因此，就业者与经济组织的关系弱化，自雇与他雇界限模糊，其带动的就业更加灵活。

在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萎缩，但是，蓬勃发展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会催生新的劳动密集型细分产业。尤其要看到，无论是生活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均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以此为背景，未来产业分工、工作模式和组织形态将更加多样化。我们要顺应这一趋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为新动能的生长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让一切创新的活力充分涌流，让一切创造的动力竞相迸发。

总之，当前疫情形势依然复杂，各级政府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化危为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本版编辑 欧阳优